

翻譯研究論叢(6)

重寫翻譯史

Rewriting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by Eva Hung

孔慧怡 著

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中心

© 2005 香港中文大學

翻譯研究論叢
叢書主編：孔慧怡

香港中文大學 翻譯研究中心

版權所有。

除獲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書面允許外，
不得以任何方式、媒介或文字
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像。

重寫翻譯史 / 孔慧怡著
國際統一書碼：962-7255-30-0
1. 翻譯研究——中國 I. 孔慧怡

<http://www.cuhk.edu.hk/rct>

目 錄

本書圖、表及附錄一覽.....	(4)
總序.....	(5)
引言.....	(9)

第一部分 從材料出發

談“譯”、“翻”、“翻譯”與“重譯”.....	(19)
中國佛經翻譯運動大事表.....	(57)
佛經外來譯者圖表.....	(63)
從譯本的流通看譯者的實際影響力.....	(75)
從《心經》和《金剛經》看佛經“新”、“舊”譯的實況.....	(87)
子虛烏有的偽譯——《大雲經》個案研究.....	(102)

第二部分 宏觀翻譯史

釐定歷史座標.....	(113)
中國的雙線翻譯傳統.....	(121)
歷朝政府翻譯活動.....	(126)
兩大文化翻譯運動.....	(140)
後記.....	(174)
參考書目選錄.....	(176)
人名索引.....	(184)

本書圖、表及附錄一覽

圖 1	西域來華譯經僧來源地分佈圖.....	(68)
圖 2	中國歷史上不同王朝的邊界圖.....	(115)
圖 3	公元前 1 世紀至公元 4 世紀亞洲地區帝國分佈圖	(118)
表 1	漢至唐外來譯經師	(71)
表 2	西域譯經僧資料.....	(72)
表 3	《佛學十三經》/《釋氏十三經》經目.....	(76)
表 4	楊文會“佛學經目”譯經部分.....	(78)
表 5	當代佛經流通資料之1.....	(80)
表 6	當代佛經流通資料之2.....	(82)
表 7	《心經》各存世譯本	(87)
表 8	《金剛經》各漢譯版本	(92)
表 9	外族在中國建立的王朝.....	(116)
表 10	政府譯人及文化譯人的對比.....	(122)
表 11	歷代特設主理對外譯事的中央政府部門	(128)
表 12	各朝政府語言政策及翻譯職位	(129)
表 13	兩大文化翻譯運動的基本資料	(140)
附錄 1	《出三藏記集》及《高僧傳》所見“翻譯”條目.....	(28)
附錄 2	唐以前存世文獻有關“譯”的記載	(30)
附錄 3	道安之“五失本、三不易”	(62)
附錄 4	彥琮之“八備”	(62)
附錄 5	鳩摩羅什和玄奘的重要譯作.....	(85)

總序

在人類文明史上，有不少進展都源於外來知識的衝擊，令社會、文化和知識系統產生巨大變化，終於使整個文化系統面貌一新。由於知識的傳遞主要依賴語言為工具，外來的知識明顯地牽涉到外語，所以翻譯一直是傳播外來知識的重要渠道。我們甚至可以說，世界上各主要文化系統的發展都和翻譯活動脫離不了關係。

公元8世紀，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國家大量翻譯古希臘的哲學和自然科學文獻，同時也引進源於印度的知識，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阿拉伯文化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8世紀到13世紀這幾百年裏，阿拉伯世界在數學、醫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說執全球科學文明的牛耳；同時，伊斯蘭教在教義和理論方面，也因為受到古希臘學術的衝擊，而建立起更完備的體系和規條。

公元12世紀，歐洲以西班牙、北意大利等地為中心，大量翻譯阿拉伯學者的著作，並且通過阿拉伯文的譯本，重新認識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思想。這些在歐洲早已成為“絕學”的文獻，從阿拉伯文再翻譯成拉丁文，直接帶動中世紀歐洲文明的重大革新。假如我們說，西方現代文明的緣起就在於這一次基於翻譯和重譯的文化承傳，也決不是誇大之言。

以上兩個例子，正好說明翻譯活動可以產生多麼巨大的促進文化發展的力量。但是假如我們再思考阿拉伯文明和歐洲文明在這段時間之後的發展路向，我們會發現它們雖然都以古希臘學術成果為基礎，後來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為什麼同樣的文獻以翻譯的方式介紹到兩個地區，到最後會演變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呢？既然外來知識是相同的，那麼最終的分別肯定在於阿拉伯和歐洲文化環境的差異了。因

此，這兩個例子也告訴我們：翻譯所造成的長遠文化影響並不取決於原著或譯作本身，而是取決於一時一地的文化環境會把外來知識引上什麼道路。

中國歷史上也有過和上述阿拉伯和歐洲類似的經驗，通過翻譯引進外來知識，達到文化上的飛躍發展和重大革新，其中最矚目的例子，莫過於歷時超過 10 個世紀的佛經翻譯運動。始於公元 2 世紀中葉而大盛於公元 4 至 8 世紀的佛經翻譯運動，可以說對中國文化的每一個層面都造成深遠影響。中國的語言、文學、民間藝術、本土信仰、宗教組織、社會風尚等方面，都因為佛學通過翻譯在中國傳播而有了新的發展；更值得注意的是，源於本土的哲學思想在佛經翻譯的高潮已經過去之後，因為得到佛學思想的啓示，完成了極富歷史意義的自我更新——宋明理學就是這個過程的產物。

同樣，明末清初歐洲耶穌會教士到中國傳教，他們通過翻譯引進中國的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學知識，不但在當時的先進士大夫群中造成影響，也間接對清末力求國家自強革新的知識分子起了啓發作用——通過翻譯而得以傳播的外來知識，在朝廷禁教之後，並沒有完全煙消雲散。從歷史和文化意義來看，清末改革派希望從“西學”入手，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可以說與明末士大夫對“西學”或“天學”的探討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翻譯傳統源遠流長，我們可以列舉更多的例子，證明翻譯活動引起的主體文化（host culture）反響是深遠而又持久的；但中國本土文化所提供的環境，在上述不同的翻譯活躍期，到底如何有選擇性地把外來知識引上某些軌道，也許更值得我們關注，因為這樣的研究才會充分顯示翻譯活動作為跨文化溝通的樞紐，其可能性和局限性在於什麼地方。綜合上面所列舉的種種情況，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要從事深入的翻譯研究，應該考慮兩大範疇：第一是主體文化的規範和環境，第二是翻譯活動與主體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產生的相互影響。

過去中國的翻譯研究一直以語言分析和文本對照為主要任務，很少涉及翻譯活動如何在主體文化裏面運作的問題。在這樣的研究範疇之內，從事研究的人很難脫離“原文”觀念的限制，也因此絕少觸及翻譯活動所能產生的龐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譯活動和主體文化之間的

互動作用。但正如上文提到，翻譯是否能造成文化影響，又或是造成怎麼樣的影響，其實並不在於語言轉換的過程，而完全視其主體文化如何制約，又如何接受這個過程的產物，所以如果我們把眼光局限於文本或翻譯機制，而漠視主體文化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面對中國翻譯傳統如此豐富的材料，實在讓人有入寶山而空手回的感嘆。

翻譯研究作為一個新學科，在 1970 年代就已經開始文化層面的探索；但我們對中國翻譯傳統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仍未達到真正突破性的發展。這套《翻譯研究論叢》的著眼點，正是從主體文化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翻譯傳統，希望通過分析前人的經驗，對翻譯活動的文化意義達到更深入的了解。

孔慧怡

1998 年 2 月於香港

引言

關於歷史

我們談論重寫歷史之前，大概應該先回答一個“後現代”的問題：對那些提倡只有文本而沒有史實的人來說，歷史只是由寫史的人虛構出來的敘述，而 20 世紀中國史實與敘述之間的差異，屢屢“圖文並茂”地為我們說明這個問題並不因“後現代主義”而起，也不會隨著“後現代主義”而消失。既然如此，我們為甚麼還要寫翻譯史呢？

歷史哲學方面的探討並不是我的專長，但過去十多年國際上不少史學家針對後現代主義所帶來的衝擊，曾作出相當深入的思考，正有助於解答“為何寫史”這個問題。Richard J. Evans 並不否認後現代觀點對於如何理解寫史和讀史有一定的啓發，但他也同時說明後現代主義者很多關於歷史的說法其實相當偏頗，常有誇大其詞或以詞奪理之嫌。¹ 如果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採取極端的相對主義，那麼不但寫歷史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類知識也都會失去穩定的立足點。再說，相對主義也並不是“後學”所創造出來的，事實上自從 20 世紀中葉以來，史學界就相對主義已有持久的辯論，其中兩人所用的譬喻更是很多人耳熟能詳的了。R. G. Collingwood 以下一段話，曾經令他被視為歷史事實的懷疑主義者：

聖奧古斯丁用早期天主教徒的眼光看歷史；泰拉蒙特用 17 世紀法國人的眼光看歷史；吉本用 18 世紀英國人的眼光看歷史……如果要問那一個觀點才算正確，那是毫無意義的。上述每個人都只可能用他本人的眼光看歷史。²

比他晚一代的 E. H. Carr 針對懷疑主義，作出以下回應：

一座山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有不同的形狀，但我們不能因此說這座山完全沒有形狀，又或者是無無限量的形狀。³

長久以來，逆主流觀點來看事物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法門，公元 5 世紀的 Herodotus 可說是“批判性歷史”（critical history）的始祖。我深信引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中國翻譯史料，不但可行，而且應該有相當價值。

啓發這本書的材料，是中國 2000 多年翻譯活動的文字記載。以近年種種“後”潮流來看，覆蓋如此廣的論文不免要惹來獨斷式權威敘事（master narrative）的嫌疑。先不說我對潮流沒有興趣，即使真的順著潮流角度看，這份擔心也是多餘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對中國翻譯史的重新思考，本身就是對現有的主流權威敘事作出的反應，這個過程的產物稱之為“反敘事”更為合適。第二，本書提出種種概念，目標是以新的眼光重看中國有史以來的翻譯活動，找尋前人沒有看出的意義，顯示前人未曾察覺的架構，藉以加強我們對於翻譯活動與中國文化發展相互關係的理解，而並非評價翻譯活動的優或劣、宜或不宜。這本書最基本的目的是向人文學科——特別是翻譯研究——的學者指出，如果肯認真審視存世資料，我們會發現中國翻譯史學到目前為止仍是一塊未開發的園地，值得我們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對整個題目重新思考。

關於重寫

說“重寫”而不說“寫”，自然是因為論述的背後有幾項基本假設：1. 目前已經有一種或多種專著談這個題目，而這些出版物在整個文化體系裡形成了主導性話語；2. 建議重寫的人認為現有的作品有不足之處：或是研究資料的欠缺與錯漏，或是研究方向或方法有問題；3. 建議重寫的人心目中有一份綱領，此綱領可能是建基於新材料之上，或是以新方法分析現有材料，又或是兩者兼備，而結果都是要建立一種新史學；4. 建議重寫的人相信從這個新角度入

手，不但可以在有關學科範圍之內提高大家的理解，同時也能突顯這門學科與其所處的文化體系有著什麼性質的關係；也就是說從深度和廣度都能有所推進。

在這裡我們先談第一點和第二點，也就是現有的各種中國翻譯史和它們隱藏著的問題。

雖然翻譯研究在中國是新興學問，而撰寫翻譯史更是一個近期現象，但在過去 15 年中，嘗試用史學角度來敘述中國翻譯活動的作品已有十多種。在這裡我們無法逐一分析其性質與寫作目標，⁴ 只能簡略綜合這些作品的一些特性，分列如下。

1. 文學傾向過重

直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有關翻譯的話語都帶有極強的文學偏向。造成這個現象，有幾個顯而易見的原因。翻譯活動首先進入中國知識主流文化是通過 19 世紀末興起的小說翻譯運動，這個運動的頂峰期是 20 世紀的頭 10 年。⁵ 由於小說翻譯運動以民族自強革新為目標（或口號），扎根於一股力量龐大的愛國主義，所以文學翻譯也因此打進了意識形態的中心位置。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標榜文學的地位，此一傳統深入人心，對於文學性的文本（包括翻譯文學）在文化體系中保持優越地位，實在大有助力。自從中國共產黨興起，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文學被視為重要的宣傳工具，這也有助於加強或維持文學作品在意識形態舞台的中心位置。最後一個因素，是中國翻譯研究建基於 1980 年代初，此時在國際翻譯研究方面興起了一股新風氣，起主導作用的是一群有比較文學背景的研究者，而翻譯研究的話語亦自此出現一大轉變。這個國際風氣大概加強了中國學者的信心，認為聚焦於文學翻譯是正確的做法。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翻譯研究這個領域，文學翻譯的中心性是由多方面的支持建立起來的，包括 20 世紀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經驗，中國傳統文化對文學的一貫抬舉，政府意識形態和政策，以及在某一時期國際學術圈子的文學偏向等等。

問題是，文學偏向是否對中國翻譯研究的發展造成障礙或阻力

呢？我的看法是：的確如此。文學偏向掩蓋了一個事實，就是在中國悠久的翻譯經驗中，文學不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學偏向也給人一個錯覺，以為用於文學翻譯的研究話語同時也可以引用於其他形式的翻譯活動。最重要的問題是，從史學觀點來看，文學偏向妨礙了研究者尋找各類型翻譯活動的共通點，以至讓大家認為中國翻譯史上各時期、各類型的活動是互不相干的。

2. 依賴二手資料

現有的翻譯史傾向於引用第二、三手資料，同時也頗愛引用名人評語，很少再加考證或思考；這個缺陷在敘述或討論 20 世紀以前的翻譯活動時，尤其明顯。要明白造成這個現象的因素，其實並不困難。要對中國悠久的翻譯經驗作出初步了解，所需的專門知識光以量來說，就足以教人望而卻步。除了整個 20 世紀的社會、文化與文學發展之外，研究者起碼要懂得中國佛教史翻譯活動的基本層面，同時也要涉獵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文化活動，更不能缺少對中國各朝歷史的基本知識。當然，上述各種學科也有些學者會從他們本學科的角度探討某些翻譯活動，但是這類探討一來並不以翻譯為中心研究對象，二來也只會涉及特定時期或特定活動類型，不可能對中國翻譯史作出整體的觀照。要達到對中國翻譯經驗全面的了解，還需要依靠專門從事翻譯研究的人。問題是，中國大陸的翻譯學者大多出身於外語系，工作單位也多半是外語系，不管主觀條件還是客觀考慮，都難以讓他們直接大量搜尋及鑽研原始材料，因此也就無可避免地要依賴其他學科——例如歷史、文學、中國佛教、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者所做出來的成果。

但我們應該知道，中國翻譯研究為這份依賴性實在付出了代價。出自其他學科的專論，自然以他們本學科為中心，翻譯活動只佔次要或邊緣地位，同時任何有關翻譯的記載，也是通過這些學科的篩選角度才進入其敘述範圍，篩選的原則並不以翻譯為主要考慮。假如翻譯研究者對這類資料隱藏的問題不是時刻保持警覺性，又對中國歷史背景缺乏深刻的理解，那麼他們筆下的歷史或敘述，

輕則讓翻譯問題失去比例上的平衡，重則讓翻譯問題埋藏於其他學科的主題之下。假如對依賴二、三手資料可能造成的失誤缺乏基本了解，其研究成果也就只是 R. G. Collingwood 所說的“以剪刀和漿糊湊拼成的歷史”⁶而已。

3. 觀點與角度

現有的中國翻譯史幾乎全部建基於以下幾種分期或分類方法：

1. 以朝代為分界線（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把 20 世紀歷史分為 1919 年以前的“近代”，1949 年以前的“現代”，及 1949 年以後的“當代”）；2. 以個人成就為焦點，亦即以個別有名的譯者為敘事單位；3. 以文本種類劃分，例如佛經、聖經、科學、文學等。根據不同的分類形式，這些翻譯史的敘述或按歷史時間順序編排，或按名家生平或文本性質編排，乍看都似乎順理成章。但歷史學家如 Leopold von Ranke 就曾經指出，歷史與年表或大事紀錄這類文本有一種最基本的分別，就是後者只是一連串事件的記錄，而前者則展示出表面看來獨立的事體有怎麼樣的內在關連。⁷ 寫史並不只是收集歷史資料，更重要的是找尋各種歷史事件的意義與模式，讓我們對整個題目和相關的事情達到更深的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有的中國翻譯史，不少似乎稱之為大事和人物紀要或資料彙編更為恰當。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面對歷史資料時，能否持開放的態度，是否願意讓歷史資料向我們顯示背後的故事，又抑或是早有固定的框架，用來套在歷史資料上，強迫資料去說我們認為它應該說的故事。很不巧，現有的中國翻譯史著述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大多緊跟著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來理解歷史活動。⁸ 下面的引文錄自一篇有關新疆（史稱西域）語言及翻譯情況的論文，正好說明意識形態的限制如何妨礙研究者把關注集中於翻譯問題上：

語言是信息的載體，而翻譯則是轉換各種語言載體的橋樑。在 21 世紀千禧之年，我們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政策的雨露滋潤下，在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懷抱中，一定會奔向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⁹

這段引文讓我們感興趣的不是其寫作風格，而是它如何不自覺地顯示出在中國約束著翻譯研究的因素。文中用上一般只見於政治宣傳文字的高姿態讚詞，其實正顯示它的主題具有極度政治敏感性。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在現有的翻譯研究作品中找岔子。我們都知道，不管是寫史的人還是他們的作品，都無可避免地染上他們的社會、政治和學術背景的色彩；要是說到學問功夫，相信沒有認真的學者會否認自己不是全材，做研究時總有點盲點和障礙。因此最重要的是讓寫史和讀史的人都知道，偏見和障礙是肯定存在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其中一個好方法就是提出其他角度來觀照歷史。

立足史料、開拓眼界

不論是挖掘理論，還是建構歷史，總得以搜集資料為起步點。按常理來說，任何學術專業的業內學者，對本身學科的認識，應該遠高於“業外人”的水平，而在資料和史實的掌握方面尤其應該如此。近十多年來有研究者提出要建立“中國的”譯學體系，但大多數人對中國 20 多個世紀的翻譯活動留下的材料卻又不願深入探究，即使稍作涉獵，也只限於零章片斷的“翻譯理論”，材料來源也都依賴翻譯通史及資料彙編；至於古人在論述與實踐之間的種種矛盾，以及導致不同翻譯策略的大文化背景，則鮮見觸及。如此一來，即使中國翻譯傳統果然有異於別國之處，我們又從何提出實證，以鞏固立論的基礎呢？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質在文化翻譯史方面顯露無遺，假如我們不吸取其他學科的成果，恐怕難有突破。

針對上述種種材料和史學角度的問題，本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展示一般翻譯學書籍沒有提及又不願意提及的歷史材料，讓讀者可以親自體會，古代翻譯活動與他們想像中的情況有多大分別。這一部分只能以點帶面，集中說明現在材料最缺乏、又最不為研究者了解的情況。近 10 年開始有翻譯學者探溯晚清翻譯活動的根源，而海峽兩岸學者研究學者傳教士貢獻的成果在過去 10 多年來更有長足進展；相對來說，佛經翻譯是中國譯學界接觸和了解最少的一面，因此本書對佛經翻譯特別偏重。第二部分通過分析原始

材料，建立一套敘事體系，但我要寫的並非通史，所以論述並不以朝代或時序為依歸，而是通過古代史籍中有關翻譯的記載，探討中國翻譯傳統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何特徵，嘗試把中國自古到 20 世紀的翻譯活動歸納起來，從文化心態、運作模式、翻譯目標等角度觀照 2000 多年的翻譯活動有何共通點，又對今天的研究者有何啓示。除此之外，本書在研究方面運用一個新觀點，把史籍中有關翻譯活動的記載分為兩類，一是事務性翻譯，一是文化性翻譯，前者牽涉的是國策民生，後者則是宗教、文化。以這個歸類法來描述中國傳統翻譯活動，再把這兩類活動因為歷史環境與政治形勢的變遷而出現匯流和整合的現象加以分析，希望可以擴闊讀者的視野，對翻譯活動與本土文化動力的相互關係達到更深一層的了解。

最後，我要就本書體例作一點簡單說明。為求簡潔，各章注釋只列作者、書名及頁碼，有關出版及版本資料，請參閱“參考書目選錄”。本書附錄 2 收錄的唐以前傳世文獻資料，以《漢達古文獻資料庫》的收錄原則為依歸，因此個別年代存疑的作品如不見於此資料庫，則不收入附錄 2。本書提及的歷史人物，其生卒年或活躍期可見於“人名索引”。

注釋：

¹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p. 219.

²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 xii.

³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26–27.

⁴ 穆雷：〈重視譯史研究〉對其中 10 種著作逐一介紹，但只作好評。

⁵ 有關小說翻譯及同期的文學翻譯活動，見 David E. Pollard,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p. xii.

⁶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p. 43–44, 59.

⁷ 這並不一定是因為作者害怕出版審查的鐵剪，又或是怕惹來政治後果。在

⁸ “政府”與“國家”分界不清的地方，也許有不少人真的相信讓學術活動為當權的政府服務是真正愛國的表現。

⁹ 迪麗達·吐斯甫汗：〈中國西域的語言文化與翻譯的關係〉，頁 44。

第一部分

從材料出發